

《首都师范大学秋韵文库》

战国秦汉治国思想

杨生民 著

ZHANGUO QINHAN
ZHIGUO SIXIANG XINFAO

新考

商鞅变法与秦治国的指导思想

西汉初期的学术与治国思想

汉武帝时期学术与治国思想的演变

董仲舒的神学思想与思维模式新探

元成时期治国思想的变化与西汉的衰亡

西汉后期谏纬的发展及其在东汉的兴衰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战国秦汉治国思想 新考

杨生民 著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战国秦汉治国思想新考 / 杨生民著. —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2011. 8

ISBN 978-7-5155-0024-9

I. ①战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政治思想—研究—中国—战国时代~秦汉时代 IV. ①D09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48153号

本书版权由金城出版社独家拥有。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, 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手段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。

版权所有©2011金城出版社 侵权必究

战国秦汉治国思想新考

作 者	杨生民
责任编辑	陆建伟
开 本	710毫米×1000毫米
印 张	17.5
字 数	250千字
版 次	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
印 刷	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书 号	ISBN 978-7-5155-0024-9
定 价	38.00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: 100013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
编 辑 部 (010) 84258699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自序

《战国秦汉治国思想新考》一书是对战国、秦、两汉用学派的思想文化治国的成败得失的考察和研究。从历史上看，西周治国用礼制。学派思想、学派文化最初是在春秋末年产生的，见于记载的有道家、儒家、兵家三家。战国时有的国家就用学派思想为指导治国。

一、从战国初期开始，为了使国家强大，有的国家就重视以法治国。首先以法治国的是魏国，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，以李悝（子夏弟子）为相，“集各国刑典”，编为《法经》一书，分为盗法、贼法、囚法、捕法、杂法、具法六篇。《法经》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。魏文侯还重用吴起（曾子弟子，也是法家的改革家、军事家），以吴起为将击秦，取河西五城。但魏武侯即位后，排挤吴起，吴起就投奔了楚国。公元前389年，吴起被楚悼王任命为令尹（相当于相），实行变法，“明法审令”，使楚国迅速强大，曾“南平百越，北并陈蔡，却三晋，西伐秦。诸侯患楚之强”。但在楚国变法的过程中，吴起伤害了贵族的利益。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，贵族作乱，射死吴起，又因贵族射杀吴起时，伤及王尸，使七十余家贵族被诛。

魏国在魏武王以后，不思改革，所以在魏国的商鞅、犀首、张仪、范雎都纷纷投奔秦国。公元前356年，秦孝公用商鞅开始变法，使秦国“有功者显荣，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”。但变法遭到旧贵族的反对。所以，第一次变法时，刑太子傅公子虔、黥其师公子贾。第二次变法时，迁都咸阳，废井田，开阡陌，奖励垦荒等。这时公子虔又犯法，所以，劓（割



鼻)公子虔。在变法过程中,秦国大败戎王与魏国等,使秦国迅速成为强国。公元前338年,秦孝公去世,其子秦惠文王即位,公子虔告商鞅谋反,于是车裂商鞅,灭其全家。商鞅虽然死了,但他的变法在秦国却成功了。

总之,从战国初期到中期,李悝、吴起、商鞅是法家学说的杰出理论家与实践家。还有慎到,也不愧是法家杰出的理论家。

此外,还有申不害。虽有学者把他列入法家,但实际上不是如此。申不害最重视的是术。所谓术,即“人君之所密用,群下不可妄窥”。所以,这种术是维护君主专制独裁的工具,恰恰是反对法的一种工具。这一点梁启超先生等人都已讲过。

至于韩非,则是位三元论者。他讲法、术、势,讲什么什么就最重要。韩非是位君主本位主义者,主张君主要执术、乘势而治国。韩非所说的法,是公布于全国的“公法”;韩非所说的术,是“操生杀之柄”、“人主所执”的私术;韩非所说的势,是君主所专有的“权势”、“威势”。因此,国君就可以在全国独裁专制。郭沫若曾说韩非学说是“法西斯式的理论”。秦国用韩非学说治国,对农民压迫太残酷,最后导致农民起义。所以,对韩非错误的地方,应当加以批判。

二、西汉初年,是以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。遗失多年的《黄帝四经》被发现后,《经法》一篇载:“道生法。法者,引得失以绳,而明曲直者也。”“执道者,生法而弗敢犯也,法立而弗敢废也。”值得注意的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把《黄帝四经》列入道家。唐兰先生从内容上来考察,说《黄帝四经》属于法家。也有学者研究认为属于“道法家”。这一事实说明,汉初用道家思想治国实际上是包括了法家思想在内的。学者提出了“道法家”是符合历史实际的。

西汉初年是重视废除秦苛法的。公元前206年汉王进入关中,与父老约法三章,就声称要废除“秦苛法”。《汉书·惠帝纪》载,惠帝四年(前191)春三月“除挟(藏)书律”,就是明令废除秦朝“藏书者族”的法令。《汉书·高后纪》载,“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(一说是诛父、母、妻

三族)、妖言令(指欺骗、迷惑人),……今除之”。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载,文帝元年(前179),发布了“除收孥诸相坐律令”。这条被废止的律令意思为:罪人犯罪,其父、母、妻、子和同产人都要没收为官奴婢。文帝时废除了这条律令,就是把罪人及家属从官奴婢的地位解放了出来。

为了促进经济发展,促进工商业发展,文帝令民铸钱、铸铁,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商品交换。后文帝又“弛山泽”,也就是开放山泽的利益,让民众开发、利用,如采集、捕捞、开矿、采伐森林等。文帝曾一度实行出关“无用传”,即停用通行证。这些措施一度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与经济繁荣。在农业方面,惠帝时收十五分之一的农业税,文帝时曾两次下令“减田租之半”,即收取三十分之一的田租。后又一连12年不向农民收田租。景帝时改为半出田租,收三十税一的田租。这在当时是有利于经济发展与农民生活改善的。

对分封割据势力诸侯王,汉文帝是表面宽松,实则警惕。到景帝时,当吴楚七国起来造反时,很快就遭到了失败。为何如此?因为民心向着中央。从高祖称帝到汉武帝即位,大约为60年的时间,这60年为汉朝的发展打了一个坚实的基础。

西汉中期,汉武帝当皇帝54年零1个月,其即帝位是在公元前141年正月,到公元前87年去世。其后昭帝当皇帝12年,宣帝当皇帝25年。三人共称帝90年。汉武帝当皇帝以后,以儒术为指导思想,同时又重法治,悉延(引)百端之学。在国内摧毁以诸侯王为代表的分裂割据势力。《汉书·武帝纪》载,元狩元年(前122)十一月,淮南王、衡山王谋反,武帝令以《春秋》决狱,处死者上万人。元鼎五年(前112),武帝又因列侯所献酎金不合法,夺爵者106人。改革到后来,使“诸侯惟得衣食税租,不与政事。”武帝对外则北击匈奴,南平百越,西伐大宛,使汉朝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。武帝伐大宛胜利以后,西域30余国归属汉朝。武帝死后36年,即宣帝甘露三年(前51),呼韩邪单于到长安向汉朝称臣。又过了15年,即元帝建昭三年(前36),外匈奴郅支单于被西域都护甘延寿等人率西域诸国兵斩于康居。



三、西汉从初期到中期，无论以道家无为而治思想治国，还是以儒术为指导思想治国，都是重视以法律、刑罚治国的。《汉书·元帝纪》载元帝当太子时说宣帝所用“多文法吏，以刑名绳下”，这里所谓“文法吏”就是研究法律、刑罚的官吏，所以他们常常用“刑名”绳治臣下。因此太子要求宣帝“纯任德教”，所谓“纯任德教”就是治国不用法律、刑罚，而用“道德教化”。宣帝听了太子的话非常失望，就说：“汉家自有制度，本霸王道杂之。……乱我家者，太子也。”这里说的“霸道”指的是要以法律、刑罚治国，而“王道”就是要用德治、仁义治国。所以宣帝与太子的分歧不在于用不用德治、仁义治国，而在于用不用法律、刑罚治国。

太子说的话并没有什么新鲜，在武帝即位初期，董仲舒就讲过这样的话。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载董说：“王者承天意以从事，故任德教而不任刑。……为政而任刑，不顺于天”等等。太子对宣帝说的话与董仲舒对武帝所说的话如出一辙。其实元帝为太子时说的话，正代表了外戚与儒学官僚地主的需要。武、昭、宣三代共称帝90年，这三代的外戚不少都是在争夺权位斗争中被处死的。如昭帝即位前，其母钩弋夫人就被武帝赐死，其原因就是怕她以后像吕后一样篡夺江山。宣帝也曾处死有“讥辞语”的大臣杨恽、盖宽饶等。所以，太子即位为元帝后，就按自己的意见办，用“纯任德教”代替了宣帝的“霸王道杂之”。元帝去世后，皇后王政君作为皇太后坐镇后宫，太后父叫王禁，生了四女八男，成帝即位后就封其舅王凤为大司马、大将军，领尚书事，独揽大权。六年后又封王凤的五个弟弟为侯。王氏一家就垄断了国家政权。《汉书·刘向传》载刘向上书成帝说：“历上古至秦汉，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”，“尚书、九卿、州牧、郡守，皆出其门”，“事势不两大，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”，“孝宣皇帝不与舅平昌、乐昌侯权，所以安全之也。”而王氏家族又飞扬拔扈，法不能制。如《汉书·元后传》载：成都侯王商“擅穿帝城，决引澧水”；曲阳侯王根“骄奢僭上”；红阳侯王立“父子藏匿奸猾亡命，宾客为群盗”。此类罪行可办死刑，甚而灭族，然而，成帝“不忍诛”。王氏专权，惹起了民愤，就说地震、日蚀等灾异为王氏专权所致。当成帝就此事问丞相张禹时，张

却说以天变讥刺王氏专权，是“乱道误人，宜无信用”。曲阳侯王根等王氏家族的人“知禹言，皆喜悦，遂亲就禹”，以表感激。此外，王氏专权时，还不经成帝同意，直接处死正直臣下，丞相王商、京兆尹王章就是被王凤等人害死的。王氏专权还把矛头直接针对许皇后一家。许皇后乃大司马车骑将军平恩侯许嘉之女，王凤当权后，迅速撤消了许嘉的职务。许皇后从嫁给太子后，生过一男一女，都在皇宫中丢失。班婕妤嫁给成帝后，有一男，数月后丢失。许皇后最后被皇太后王政君亲自下令废去后位，而后成帝又赐废后药，令其自杀。

这一阶段，外戚王氏还只是垄断了国家政权，到了王莽竟然要篡夺汉朝的政权。王莽先是以天降的符命，当了摄皇帝。其后，又以天降的符命当了真皇帝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，竟然为王莽篡夺汉朝江山，建立新朝立下了大功！

四、在战国、秦、汉时期，除了法、道、儒这三家思想对社会发展都起过重大作用之外，阴阳家思想、董仲舒天人感应说对社会历史也起过这样或那样的作用。现在就后两种思想所起作用，再谈一些意见。

（一）阴阳家邹衍的思想在汉以前就有一定影响。如：邹衍认为：五德终始说指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五种元素相生相克、终而复始、循环变化。各个朝代也是如此的循环变化，因此，在制度上则应改正朔、易服色。但文帝时这个问题争论很大，有人认为秦为水德、汉当为土德。丞相张仓认为：汉为水德，文帝十二年河决金堤就是符应。因分歧太大，文帝没有作出决定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阴阳家中载有《邹子终始五十六篇》，可知“五德终始说”在邹衍学说中的重要地位。然而，一种学说能否行通，要看其是否符合客观实际，而不是任意编造。到武帝时，出现了董仲舒的三统说。在董看来，黑、白、赤三统的循环往复就是历史发展的三统说。夏朝为黑统，以寅月为正月（即夏历正月）。商朝为白统，以丑月（即夏历十二月）为正月。周朝为赤统，以子月（即夏历十一月）为正月。三统循环，每个朝代，都要改正朔，易服色。董的三统说是直接从阴阳家的“五德终始说”发展而来的。

秦朝用的历法是战国时制定的颛顼历，以农历十月为岁首，西汉初期沿用。汉武帝时制定的太初历，采用夏历（今农历）以寅月（即正月）为岁首，至近代已沿用两千多年。相比之下，董所说的三统历，比太初历要落后得多。

（二）另一个问题，是谶语产生的问题。什么是谶语呢？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：“谶者，诡为隐语，预决吉凶。”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载方士燕人卢生就利用“亡秦者胡也”一语，欺骗秦始皇。其后到汉文帝、汉武帝时，方士常常因欺骗皇帝而被处死。方士系阴阳学派的人，称能让皇帝长生不老来欺骗皇帝，又因谋反常被处死。武帝时，董仲舒提出“王者，承天意以从事，故任德教而不任刑，为政而任刑，不顺于天。”宣帝时，太子（后为元帝），主张治国应“纯任德教”，不用刑罚。这与董仲舒的意见一脉相承，也正符合后来王莽篡夺汉朝江山的需要。所以，谶语的出现正适合一些人篡夺江山的需要。西汉末，又出现了纬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上册卷六中说，“纬者，经之支流，衍及旁义”。这就是说，纬书在解经时有着大量篡改历史真实的神学思想。西汉末，刘秀信奉谶、纬是为了争夺天下。后来到白虎观会议上，谶、纬成了国家的指导思想。篡夺了西汉政权的谶纬思想，到东汉却成了保卫东汉政权指导思想。这些都是两汉思想史上的大事。

（三）再一个问题是关于董仲舒评价的问题。现在先从董仲舒举贤良对策时间谈起。《汉书·武帝纪》载，董举贤良对策在元光元年（前134）五月。《汉书·严助传》载，严助举贤良对策时间在建元元年（前140）冬十月。而且，这年就选拔了严助一人。《汉书·公孙弘传》载，公孙弘对策时间是在元光五年（前130）。《资治通鉴》则说董仲舒与严助两人对策时间都在建元元年冬十月。而公孙弘对策时间在元光五年，元光元年五月这次对策竟然无人被选拔出来，这难道不是笑话吗？应当说，这是《资治通鉴》改了历史事实留下的错误。至于《通鉴》为什么要这样改，恐怕也是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了。

此外，本书第四章收录了作者写的两篇文章：一篇是《董仲舒的天人

感应说与巫术的关系》，文中引用柳宗元的话说，天人感应说“其言类淫巫瞽史”，欺骗、迷惑后人。另一位英国学者詹·弗雷泽在《金枝——巫术与宗教之研究》中说“巫术的原理已渗透到天人感应之中”，“它是一种伪科学”，“也是一套谬误的指导行动的准则”。另外一篇文章是《董仲舒的天人关系、阴阳五行说与“原始思维”》，《原始思维》是法国学者列维·布留尔写的一本书。书中指出，原始人思维的基本特点有二：一是专门注意神秘的原因与作用，即鬼魂、神灵、巫术。二是对不同性质的事物只求同、不求异。“服从于互渗律，……对矛盾采取完全不关心的态度”。这些观点，与孔子、孟子、荀子都不同，而恰恰与董仲舒的观点相同。本文论证了董仲舒所鼓吹的天人感应说恰恰与《原始思维》相同，又与神灵、神学、巫术的方法相同。所以，董不是儒家，而是一位神学家。这两篇文章的意见，可供读者参考。

写这本小书整整用了我十年的时间。在写作过程中，宁可先生常常向我介绍有关的文章与书籍，有时还把他的藏书借给我看，与我讨论一些与本书有关的一些观点，使我受益匪浅。我在这里仅向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目 录

自 序

第一章 商鞅变法与秦治国的指导思想

第一节 商鞅变法的历史背景 / 2

- 一、春秋时期重民轻天思想的发展 / 2
- 二、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改革 / 4

第二节 商鞅变法与秦国指导思想的确立 / 8

- 一、卫鞅变法与变法的内容 / 8
- 二、商鞅变法与秦国的指导思想 / 11

第三节 秦继续改革与先易后难、远交近攻的策略思想 / 14

- 一、先易后难策略思想的出现与作用 / 14
- 二、远交近攻策略思想的出现与作用 / 17

第四节 秦统一前后学术思想政策的演变 / 23

- 一、吕不韦当政时期秦学术思想的变化 / 23
- 二、秦始皇统一各国的条件与意义 / 25
- 三、秦朝速亡的学术思想原因考察 / 27

第五节 法家学说的发展、蜕变及其历史命运 / 36

- 一、战国时期法家学说的出现与发展 / 36
- 二、战国中期以后法家思想的蜕变 / 41
- 三、战国时期法家学说的历史使命 / 51

 第二章
西汉初期的学术与治国思想

第一节 汉初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的出现 / 60

- 一、汉初刘邦对治国人才与思想的寻求 / 60
- 二、无为而治思想的提出与推行全国 / 65

第二节 文景时的无为而治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/ 69

- 一、令民铸铁、开矿，促进工商业发展 / 70
- 二、减轻徭役、田租，发展农业生产 / 72

第三节 以法治国、恢复发展道德与学派文化 / 75

- 一、废除秦暴政苛法内容概述 / 75
- 二、汉初以法治国的历史特点 / 78
- 三、重视道德建设、关心民众疾苦 / 81
- 四、初步恢复与发展学派文化 / 86

第四节 汉初学术思想政策中应探讨的两个问题 / 89

- 一、道家思想在汉王统一国家过程中的作用 / 89
- 二、文景时期其他学派的作用与影响 / 93

第五节 从无为而治治国到“仁政”的实现 / 98

第三章 汉武帝时期学术与治国思想的演变

第一节 罢黜百家与董仲舒举贤良对策时间考 / 102

- 一、“罢黜百家”始于何时考 / 102
- 二、董仲舒《举贤良对策》时间考 / 105
- 三、公孙弘举贤良对策时间考 / 109
- 结 语 / 112

第二节 汉武帝尊儒术、重法治与悉延百端之学 / 113

- 一、尊儒术 / 114
- 二、重法治 / 122
- 三、悉延（引）百端之学 / 128
- 四、武帝在思想文化上的失误 / 134

第三节 汉武帝搜求遗书与倡导诗、赋的贡献 / 140

- 一、搜求、收藏遗书对思想、文化的贡献 / 140
- 二、乐府歌诗与汉赋的发展 / 144

第四节 论武帝“悉延百端之学”与董仲舒的区别 / 152

- 一、汉武帝与董仲舒对法家态度的区别 / 153
- 二、“灭息”百家学说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吗？ / 156
- 三、结 语 / 161

第四章 董仲舒的神学思想与思维模式新探

第一节 董仲舒的神学思想与对匈奴的态度 / 164

- 一、董仲舒《举贤良对策》中的神学思想 / 164
- 二、《汉书·仲舒传》夸大董仲舒功绩的事例考 / 167
- 三、董仲舒有“有王佐之材”吗？ / 171

第二节 论董仲舒的“天人感应”说与巫术的关系 / 173

- 一、董仲舒“天人感应”说与巫术文化 / 173
- 二、董仲舒“天人感应”的内容与遭遇 / 176
- 三、关于天人感应说的评价问题 / 180

第三节 董仲舒的天人关系、阴阳五行说与“原始思维” / 183

- 一、董仲舒对天人关系与天人感应的论证 / 184
- 二、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 / 188
- 三、应注意不同思维方式、方法的作用不同 / 192

第四节 董仲舒的历史观与天人感应说 / 194

- 一、董仲舒的历史观 / 194
- 二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与社会前进的动力 / 196
- 三、天人感应说在武、昭、宣时期的遭遇 / 197
- 四、方士与董仲舒神学思想的异同 / 199

第五章

元、成时期治国思想的变化与西汉的衰亡

第一节 宣帝时“霸王道杂之”与“纯任德教”之争 / 204

一、“霸王道杂之”与“纯任德教”之争的内涵 / 204

二、汉元帝“纯任德教”的社会后果 / 210

第二节 外戚王氏专权与王莽篡汉立新 / 216

一、外戚王氏专权打击正直朝臣事例考 / 217

二、王莽专权与篡权立新 / 221

第六章

西汉后期谶纬的发展及其在东汉的兴衰

第一节 西汉后期谶纬神学的内容与出现 / 230

第二节 谶纬神学在政治上的作用与后果 / 234

第三节 反对谶纬的意见与谶纬的衰败 / 246

附录 论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——也谈思想方法问题 / 251

后记

第一章

商鞅变法与秦治国的指导思想

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各国兼并战争的发展，建立在宗法分封制基础上的政治、经济体制经不起考验，于是各国出现了改革的浪潮。在改革中，秦国选择了以法家思想为指导，使秦国迅速强大，并经几代持续不断的改革，终于统一了中原各国。然而，秦朝又迅速灭亡。从治国思想来考察，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，本章对此进行了探讨，仅供参考。

第一节

商鞅变法的历史背景

一、春秋时期重民轻天思想的发展

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统治思想是国家宗教或称宗法性宗教，有学者指出：“宗法性宗教产生于原始社会之后，私有制和阶级、国家建立的初期，在夏、商、周三代是国家宗教，并且是社会上唯一的意识形态。中国古代宗教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，以社稷、日月、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羽翼，以其他鬼神崇拜为补充，形成了固定的郊社、宗庙及其他祭祀制度，形成维系古代社会秩序和宗法家族体制的根本力量。”^[1]

西周灭亡以后，社会上出现了轻天重民的思潮。如《左传》桓公六年（前 706）随国季梁说：“夫民，神之主也。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。”《左传》庄公二十三年（前 672）虢国史嚣说：“国将兴，听于民；将亡，听于神。神，……依人而行。”《左传》僖公十九年（前 641）宋司马子鱼说：“民，神之主也。”随着这一思潮的发展，人们对天（上帝）失去了信任。如《左传》昭公十八年（前 524），郑国子产说：“天道远，人道迩（近），非所及也。”这就是说，在子产看来，天太远了，解决不了问题。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六年（前 516），“齐有彗星，齐侯使禳之。晏子曰：

[1] 牟钟鉴等著：《中国宗教通史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0 年版，第 78 页。